

学者书库·史丛 XUEZHE SHUKU · SHICONG

上海总商会史 (1902-1929)

徐鼎新 钱小明 著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学者书库 • 史丛 •

上海总商会史

(1902—1929)

徐鼎新 钱小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范一辛

·学者书库·史丛·

上海总商会史

1902—1929

徐鼎新 钱小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61000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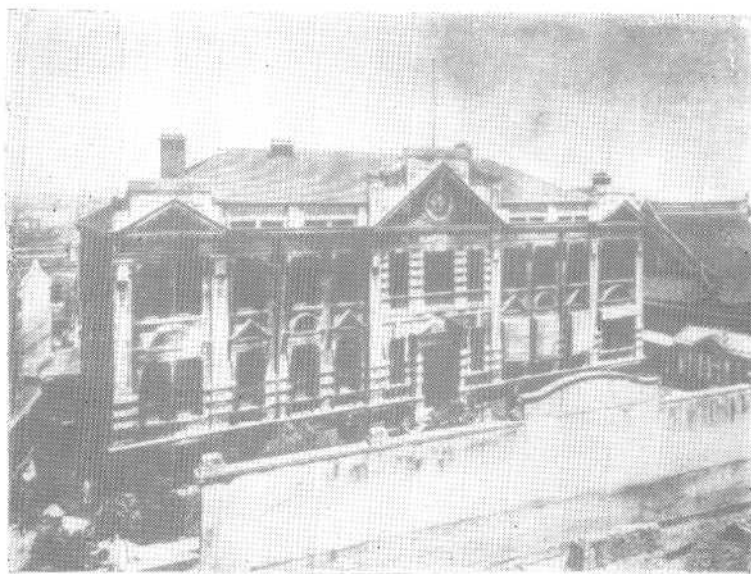
印数 2801—4300

ISBN7-80515-651-4/K·91

定价: 8.0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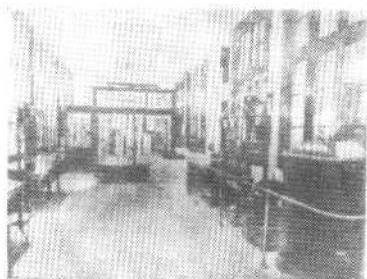
上海總商會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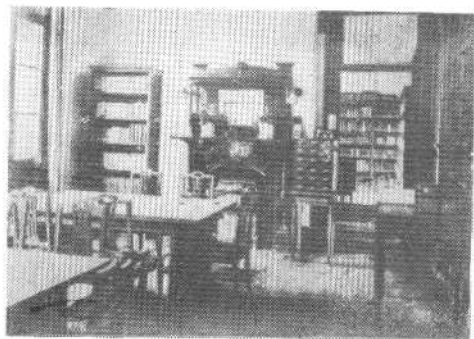
上海總商會議事廳外觀



◀ 上海总商会附设商品陈列所针绣馆



▼ 上海总商会附设商业图书馆一角



▲ 上海总商会附设商品陈列所仪器馆

上海总商会自办期刊 ▶



曾铸(少卿)，第一届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第二届上海商务总会总理。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抵制美货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
严信厚(筱舫)，上海商会创始人，曾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董、总理，第一届上海商务总会总理。

周金箴(晋籛)，清末民初连任四届上海商务总会总理。▶





◀ 朱葆三(佩珍)，曾连任三届上海总商会会长。



▲ 聂云台(其杰)，1920年上海总商会历史性改组后当选会长，是著名的上海工商界革新人物。



◀ 虞洽卿(和德)，历任上海商务总会(总商会)议董(会董)，1924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丁 日 初 序

进入8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利用商会档案资料研究问题，一些城市的研究机构同档案馆合作整理、编纂商会档案，有的学者则积极从事商会活动史的研究，还举行过近代商会与资本家阶级的讨论会，在同商会有关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势头。本书作者徐鼎新副研究员于80年代前半期参与撰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当时即着力从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商会档案中收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认识到研究商会不但对研究资本家阶级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各方面的历史，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在上述课题完稿之后，他决定就他最熟悉的上海商会作深入的研究，准备写出一部专著。他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先写出一批颇有份量的专题论文，引起国内外历史学界的注意。然后他得到当时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钱小明同志的襄助，共同完成了这一研究项目。现在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一部书，就是他们倾注了心血的成果。

这部《上海总商会史》从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诞生前后起，到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前后止，写了各个时期不同名称的上海总商会的主要活动。虽然本书最末一章的最后一节论述上海工商界反对国民党控制及其结局时，就这一问题写到1929、1930和1931年的某些重大事件，但已经不涉及总商会的其他方面的活动了。作者认为，国民党上台后“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志下的附属地位”，它“叱咤风云的精彩场面则再也看不到了”，因而将本书结束于国民党上台之初，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安排。

通观全书，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上海商会早期机构的建立和以后的革新；二、自1905年起参与历次重大的反帝运动；三、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四、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本书各章基本上都以充分的资料为基础，对有关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我注意到，不但已经发表的关于上海商会活动的论著所使用过的重要材料，都为两位作者所运用，而且在书中还能读到没有为其他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由此可见，他们对搜集史料确实花了一番功夫。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学术界兴起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风气，论坛上出现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资本家阶级及其商会的突破旧观点、提出新见解的许多论文。两位作者从这样一批新的论著中吸取了养料，经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许多问题的分析达到了新的水平。我认为这是一部研究上海资本家阶级与上海商会活动的材料相当丰富、立论基本允当的有价值的著作。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一本好书也难免有它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上海总商会史》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完善，例如关于上海商会组建的背景，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上海的发展和外国近代社会思潮对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外，如果再就同甲午战后清廷转而逐步实行振兴商务的政策的关系展开论述，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更加全面。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现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对资本家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区分什么情况是由于这一阶级的软弱性造成的，什么情况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作出妥协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以利下一次的斗争（就是工人阶级也必须作这样的妥协），那就不是资本家阶级特有的妥协性。这种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这本书对于上海总商会的研究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今后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鼎新同志最近告诉我，书稿完成以后，他对上海总商会早期绅

商领导体制作用的想法又有新的进展，我钦佩他对学术研究不故步自封的精神。我希望今后继续读到他有关这一课题的新的研究心得。同时我期待着整理上海总商会档案资料的研究者们，早日将档案资料汇编成书，出版问世，并且写出一部上海总商会的全史，将这一研究再向前推进。

1991.7.16

前 言

编写一部《上海总商会史》，是我多年萦怀的愿望，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的共同要求。

中国的商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法定团体，在解放前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商会组织，因其成立的时间最早、社会影响最大，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突出，而受到社会的广泛瞩目。特别是跨越清末、北洋军阀统治两个历史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及其前身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政府驾驭无方；或是军阀混战，政出多门，所以上海商务总会或上海总商会基本上是在官方难以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按照它所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进行自主活动的。它较早地摆脱“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直接以一种社会和国家“主人”的面目出现，参预、干涉内政外交事务，常常在一些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率先表态，领衔发出函电，带头发难和开展活动，从而产生“登高一呼，众山响应”的社会效应。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作出过不少叱咤风云的举动，创建了一些彪炳史册的业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偏见，以及商会中人特别是一些执掌商会权力的上层资本家与外国资本、本国封建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存在于他们身上的那种动摇性、软弱性在上海总商会的活动中也典型地体现出来，不但削弱了它在社会活动中应有的作用，而且往往在变幻的政局发展中走入歧途。因此，对上海总商会的历史作一点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

无疑会有助于加深对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以至中国资产阶级整体的本质认识。这正是我和我的同事钱小明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在十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我国史学界竟无一本著作、一篇文章公开出版或发表，偶而出现的公开文字，也都是加上种种骂名的被歪曲了的商会形象。在“左”的思潮统治下，商会的命运也与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一样，被列入批判对象而大张挾伐，以致这个学术研究领域在无人敢于问津的情况下形成一片未经开垦拓植的荒漠原野。

但是，国外不少学者对中国商会特别是上海总商会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给予充分的评价，作过不少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之下，国内史学界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一些过去被当作“禁区”的学术研究领域，陆续有一批勇敢者进行开拓，作出了很多成绩。长期被湮没、尘封的上海总商会历史档案开始组织力量着手整理，重见天日。史学界第一个利用档案、史料对上海总商会以及它所代表的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作用进行深入、具体考察，并作出新的有创见性论证和评价的是丁日初先生（《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1982年，我在参与编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过程中接触到大量有关上海、天津、苏州及其他地区商会的档案、史料，在合作者姜铎先生的鼓励下，写了一篇《旧中国商会溯源》的论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注意，日本学者仓桥正直副教授还把它全部译成日文，在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学报上发表。这可以算是我研究中国商会的开始。在以后的数年内，蒙上海市工商联档案室的大力支持，使我得睹上海总商会不少重要的档案及史料，从而使我食指大动，萌发出编写一部完整的《上海总商会史》的想法。1986年前后，在丁日初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把《上海总商会史》正式列入研究项目，1990

年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审评批准，列入“七五”国家社科(近代)重点项目的资助范围。全书共11章，原定第1、2、7~11章由我执笔，第3~6章由我的合作者钱小明担任，但她完成第3章初稿后，因事出国赴美，使我不得不勉力承担除第3章外的其余10章的编写任务。本书未能充分发挥我的合作者、颇有才华的钱小明的研究潜力，为本书留下她更多的精湛见解，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现在，在各方策励帮助之下，这本著作终于全部完成，蒙丁日初先生在百忙之中对全部书稿进行审阅，并撰写了序言，为本书增色，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收集资料过程中，曾先后得到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苏州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复旦大学历史系杨立强、经济学系徐培华、上海市博物馆杜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等同志曾给予很多帮助；国外学者也对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出版予以热情关注，其中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教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奥村哲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博士生饭岛涉先生、美国西方大学东亚系主任陈锦江教授、美国里德学院顾德曼(Bryna Goodman)副教授等，都先后向我们提供了有关重要资料，谨在此对他们的盛情支持表示谢意。

由于历经沧桑，上海总商会的重要历史档案大半散失，虽然通过从各方面广泛收集作了一些补救，但还不能说达到占有资料的充分程度。加以我们理论水平和分析研究能力不高，书中疏漏、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史学界同仁及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徐鼎新

1991年2月6日

目 录

丁日初序

前 言

第一章 孕育上海商会的社会内在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 ···	1
一、20世纪揭幕前后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管窥·····	2
二、近代社会思潮对上海工商界的冲击和影响·····	24
第二章 上海商会的发轫及其组织构成 ·····	37
一、中外商约谈判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诞生·····	37
二、上海商务总会的建立及其构成、职能分析·····	58
第三章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与上海商务总会 ·····	67
一、积极倡导抵制美货·····	67
二、伸国权，保商利·····	76
三、上海商务总会的改组与曾少卿的上台、下台·····	87
第四章 清末社会动荡变乱与上海商务总会的对策 ·····	93
一、“挽回利权”声中的商务自救活动·····	93
二、清末金融恐慌的困扰和上海商务总会的维持市面 方策·····	113
第五章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商务总会（总商会）的政治活动 ···	129
一、华界试行“地方自治”，租界争取“华人参政”·····	129
二、“君宪”幻梦的破灭和上海商会内部革命潜流的 滋长·····	138
三、同心协力，光复上海·····	154
四、“二次革命”与上海商会上层的向背·····	166

第六章 民国初期上海总商会的组成及其经济活动	179
一、上海总商会建立经过及其组织构成	179
二、参加全国临时工商会议，推动商会之间的大联合	187
三、为商民请命，要求减轻税捐重负	201
四、对北洋政府停兑令的态度	210
五、迈不开经济近代化的步伐	215
第七章 五四运动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230
一、“佳电”的风波与上海总商会声誉的坠落	231
二、1920年上海总商会改组反映的革新潮流	243
第八章 若干革新措施及其社会效应	253
第九章 从参预政治到“国民自决”	289
一、行使政治民主权利的若干活动	289
二、“国民自决”的产物——“国是会议”与 “民治委员会”	310
第十章 五卅运动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325
一、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种种表现	325
二、政治转向及其社会、阶级根源	354
第十一章 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361
一、上海总商会内部矛盾的公开化	361
二、摊认饷捐、库券的不同心态	369
三、外争关税自主，内求消弭工潮	379
四、反对国民党控制的斗争及其结局	390
附录：上海总商会大事记	402

第一章 孕育上海商会的社会内在 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

中国的商会，是伴随着 20 世纪揭开序幕而应运诞生的。它是当时中国社会母体内孳生和初步发展起来的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也是近代思想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产物。上海，这个在鸦片战争以前便享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称誉的沿海城市，自 1843 年辟为商埠后，更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等条件，进一步沟通与内地城乡之间以及与海外各埠的经济联系，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并迅速取代广州而跃居对外贸易的中心。这里，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最早传播的城市之一，欧风东渐，西学勃兴，在 19 世纪后期上海便出现了一批攻研、鼓吹西学，热心救国的知识分子，先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报刊，为西学的传播推波助澜，“新天下耳目，开天下风气”，使这个居“十数行省冠盖往来之冲，四方百国舟航鳞萃之所”的申江巨埠，“见闻既广，扬激有权，先知先觉”。^①上海商界中人，或因受雇于在沪的外商企业，或因从事商品进出口贸易的购销活动，与外商频繁交接，并在西学传播的影响下较早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因而，要求仿效外国成例，组织新型的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商会的呼声，很快便在上海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

^① 梁志文致汪康年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26 页。

一、20世纪揭幕前后上海民族 资本主义经济管窥

中华民族在自己国土上培植并获得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既区别于渗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区别于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封建自然经济。但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它的存在和发展，与本国传统经济及外国资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首先从流通领域内开始的，并且始发于上海这样一类对外贸易兴盛的沿海城市。五口通商以前，上海虽然已是櫓桅如林，商贾辐辏，但主要限于国内埠际之间的贸易，对外贸易只在较小范围之内间接地进行。上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重心自广州口岸北移，上海的商业贸易便逐渐从原来基本属于封闭性的内贸型市场转变为开放性的外贸型市场，进出口商品贸易的总值和总量与年俱增。开埠后的第三年，即1845年，英国经由上海输入中国的商品和从上海口岸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比上一年增加63.8%；到1853年和1856年，更分别比1844年增长达2.6倍和5.7倍。^①在后续的若干年份内，依旧保持着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表1-1是根据海关统计资料可以查知的1865~1902年间上海历年进出口贸易货值变动情况：

① 参见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